

# “泥鳅党”“三无船”……长江禁捕“牛皮癣”难愈

《半月谈》

长江全面禁渔退捕后,鱼类得到休养生息。但记者前不久跟随民间护鱼志愿队夜巡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仍有“泥鳅党”“三无船”给长江鱼类造成威胁,成为全面禁渔退捕的“牛皮癣”。

## “泥鳅党”:专钓江中凶猛鱼类

记者跟随一支志愿护鱼队,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渝交界处进行了整夜巡护。该保护区覆盖地维长江大桥以上115公里的自然江段,此江段氧气充足,水流湍急,是长江鲟、娃娃鱼等珍稀水生动物的家园。

下午4时,该志愿护鱼队7名队员驾驶两艘快艇沿江而上进行巡护。不久就在长江右岸的一片茂密草丛中,发现正在非法捕鱼的“泥鳅党”。这些非法捕鱼者用泥鳅作为诱饵垂钓,看到执法船来便匆匆逃走,留下五六根挂着泥鳅的鱼竿竖在岸边。护鱼队员随即将这些捕鱼工具清缴。

护鱼队员告诉记者,以前每到晚上这里便布满地笼网,甚至还有电鱼的。2020年全面禁渔退捕实施后,长江生态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相关部门也加大了



护鱼队员正整理收缴的非法钓鱼工具

打击非法捕鱼的力度,网鱼、电鱼现象很难见到,但仍有“泥鳅党”频繁来侵扰,他们专门用泥鳅诱钓江中凶猛鱼类,一次下竿几支甚至几十支,对江中鱼类构成威胁。

在一处岸边的礁石上,记者跟随护鱼队看到了几名“泥鳅党”仓促撤离后的场景:几盒煮好的方便面散落一地,锅里几条已煮熟的小江鱼,这些鱼有的只有几厘米长,已经很难辨认种类。记者跟随护鱼队巡护一晚,收缴各类鱼竿50余支。在护鱼队的办公室内,摆放着上千支收缴来的鱼竿。

经采访了解,一些“泥鳅党”为应对护鱼队的巡护,专门用竹竿、木条制作成本低廉的鱼竿,有的直接用手线(一种没有鱼竿只有鱼线的钓鱼工具)挂着泥鳅垂钓。这些新的钓鱼方式成本低廉、更加隐蔽,即使因撤离紧急而落下,损失也很小。

记者多地走访发现,“泥鳅党”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其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利益。长江边一家餐厅老板告诉记者,每天都有“泥鳅党”把钓到的渔获卖给他们,主要有鲶鱼、鲈鱼、翘嘴鱼等,其中鲶鱼市场价60元一斤,鲈鱼和翘嘴鱼的价格在80元一斤左右,其他稀有品种价格更贵。

## “三无船”:有的该拆“拆不掉”

除了“泥鳅党”,“三无船”也是现阶段全面禁渔退捕的主要威胁之一。记者采访了解到,部分“三无船”成了拆不掉的“船坚强”,即便因为非法电鱼被缴获,很快又能被人取走,甚至就停放在执法船旁边。

记者跟随护鱼队巡护至一片水域时看到,江面上停靠着4艘“三无船”,其中两艘绑在一起,上面盖着密封的油布,还有一艘拴在一艘执法船的船尾。

“你看这艘船的马达多大,比我们的船速度还快。2020年,这艘船外出电鱼时,被我们缴获,并移交给了公安部门,但很快就被渔政部门取走,连同另外3艘船一直停靠在这里。”护鱼队员指着和某执法船拴在一起的“三无船”说,按要求“三无船”是要进行销毁、拆解的,但这几艘船就是拆不了。

护鱼队员介绍,电鱼的船多是“三无船”,它们白天停靠在江岸草丛或其他趸船边上,夜晚出来作业。“过去鱼少,两三个小时才能电一船鱼,现在鱼多了,不到1小时就能电一船鱼,作业时间更短,利润空间更大,查处的难度也更大。”

记者了解到,2020年全面禁渔退捕启动后,沿江多区县将“三无船”列为整治重点,采取销毁、拆解、改造等多种方式消除其带来的禁渔隐患,但仍有少数“三无船”拖而不拆,其中多为“关系户”。

## 强化管护协同,清除禁渔顽疾

基层执法者和专家表示,当前长江大保护出现了可喜态势,长江鱼类得到休养生息,生态环境逐步向好。但暴利驱动下,上述非法捕鱼乱象仍在消解禁渔退捕成效,亟待根治。

护鱼队员表示,打击“泥鳅党”“三无船”,仅靠水上执法难以奏效,须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充分调动基层政府和人民群众护鱼积极性,形成长江生态人人护的良好氛围。特别要加强水陆协同,谨防非法捕鱼者“打游击”。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表示,长江大保护是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加强协同。针对当前禁渔工作中出现的“找人情”等问题,纪检监察部门可介入深挖,严厉整治禁渔工作中的干部作风问题,坚决打击非法捕鱼者背后的“保护伞”,为禁渔提供优良的政治生态。

此外,民间护鱼队伍具有自发性强、积极性高、效果突出等优点,在长江大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官方执法的有效补充。建议有条件的地区积极规范、引导,进一步扩大民间护鱼队伍,让更多力量参与,守护长江生态。

# “我的那份‘不正式’的工作,父母渐渐理解了”

《工人日报》赵昂

对于许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而言,每年春节回到老家,如何解释自己做什么工作,如何解释自己为何不回老家考个公职,确实是个难题。老人家的希望是现世安稳,子女们想要的是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在不解、冲突和交流中,两代人慢慢找到对未来共同的向往和追求。

今年过年,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胡晓媛没有回到老家。她一直担心,自己会在拜年电话里和父母再一次吵起来,“父母之前总是催我回家‘考编’,说女孩子考了编有了公职才算稳定。他们一直认为,我在北京的工作不算是个‘正经工作’。”

## 要理解这份“不理解”

在北京一家外企从事会计师工作的刘先生,以前从来不愿意在老家谈及自己的工作,因为,老家人不能理解注册会计师和村里会计的区别,“结果传来传去,就传成了‘老刘家的孩子去了北京上大学,结果就当个记账的’。”

刘先生自己倒没觉得什么,只是每次回乡,别人问起他都记什么账,每天要点多少钱,他往往只能笑笑,“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审计,大部分时间是在出差,经常要去外地的公司做审计。老家人对我的职业了解有限,事实上,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办公地基本在省会及以上城市,老家人不了解很正常。”

“我爸他一直不肯跟别人说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北京一家“红圈所”做律师的李先生同样有难言之隐,老家人不理解,老李家好不容易供儿子考上了某所政法大学,儿子为何成不了县里的大法官,吃上“皇粮”?

“两代人有不同的成长背景,那一代人是种田长大,老一代人甚至还有那种考上大学就是要当官的认知,最次也能回县城当个官。当然这种认知随着大学扩招,村里大学生多了,已经逐渐消退了。”父母有时候说起儿子是律师,老家人对律师的认知主要来源于电

视剧,认为李先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法庭上辩论,还少不了电话咨询各种事情,大抵都是小额的财产纠纷,其实李先生是非诉律师,但说多了,对方也不理解。

## “不正式”的工作也有意义

为了不让父母到处说儿子“懂法律”,以免老家亲朋咨询各种法律事务,李先生没少费口舌,“我倒并不是怕‘白干’,关键是律师这行分得非常细,隔行如隔山。一个搞公司方面业务的律师,你问家事、刑事问题,是真不敢乱回答乱出主意,还是要找负责这方面的专业律师靠谱。”

在北京一家合资外贸公司工作的王鸿强,也曾遇到这样的“不理解”。因为要和海外客户对接,因为时差问题,王鸿强经常是夜里开视频会,白天睡觉,这一点一度让父母不理解。

后来,隔壁乡有了加工厂,不少村民到工厂打工,产品主要是卖到海外的,订单有时多,村民们就要加班加点,收入就高,但有时候“莫名其妙”的,订单就少了。渐渐地,和其他村民一样,王鸿强的父母知道了“汇率”和“关税”,尽管不知道这些究竟是怎么运转的。

“我跟爸妈说,你看,这产品不是装车运出去就能收到钱的,要有人买,有人付款,要过海关,要安排船。

外贸工作就是帮你们撮合这些事情,让大家都能有钱赚。”王鸿强说:“现在父母也就理解了,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影响着他们的收入和生活。”

记者调查发现,近些年,一些新兴的行业,比如网上直播、旅游博主,还有剧本杀公司等创业项目,曾经被上一代人顽固地认为“没工作”,是个“临时工”。可是随着电商的普及,他们不仅看到这些“不正式”“不正经”的工作可以赚钱养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根据自己的兴趣,把爱好做成了事业,成了创业成功的企业家。

## 对未来的追求有了共识

今年,胡晓媛并没有听到父母催“考编”。因为,网上买东西,出门扫二维码,父母渐渐知道了互联网的影响,也知道这行收入高。现在他们说的是:“我女儿在北京,干互联网的。”

还有一点,父母渐渐明白,“考编”考上了,并不是自己以为的“享清福”,甚至也不是铁饭碗了。“你表姐前年考上了那个单位,周末都忙着呢。”而经常去乡里办事,看到工作人员工作繁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父母的看法。“稳定是相对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趁年轻应该为自己的未来多努力。”胡晓媛和父母达成了共识。

而另一方面,一些游子也理解了父辈的担忧,在工作和生活之间重新寻找平衡。今年春节,刘先生跟父母说,“过一段时间,我回省城‘记账’啦。”父母还不知道,刘先生已经申请调职,到老家省城的办公地工作。“虽然收入相对于北京有所减少,但省城落户容易,孩子上学什么的都好办。”

随着交流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老人理解了,不管是老一辈在大街上卖白菜,还是小一辈在网上卖化妆品,时代变了,工作方式变了,但大家都是靠辛苦赚钱,希望靠劳动过上好日子想法没有变。